

失败的半生——评V.S.奈保尔的《浮生》*

周文静

(武汉纺织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V.S.奈保尔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不久发表了《浮生》。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虚构小说表面上是老生常谈,表现了主人公威利生活的虚无,身处宗主国的文化无力感,对文化身份无根的困惑。但与之前小说不同的是,奈保尔试图通过主人公威利告诉我们,他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努力地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寻找上述等问题的答案,他试图要给自己的精神流亡生活找到一个圆满的归宿,但最终失败了,所以,流亡知识分子要想获得文化无根的安全感和完整的人生是很艰难的,小说中,威利的前半生是失败的。

[关键词]《浮生》;文化无力;文化无根;性;流亡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4)04-0030-03

奈保尔在荣膺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两周就出版了小说《浮生》(Half A Life)。尽管他本人并不承认这是一部自传体,但读者可以很容易看出其中的蛛丝马迹。因为,主人公威利与奈保尔的人生经历大致相同。小说自出版之后,批评多于赞美。乔治·帕克说:“只是在早已耕耘过多次的土地上劳作。他似乎已经说过了该说的一切。”^{[1][2]}但读完小说就会发现,奈保尔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他似乎要通过威利向读者宣布什么。也许他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所以,小说人物的下半生成了一个谜团。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浮生》只是为了兑现与出版商的约定,而《魔种》(《浮生》的续篇)是封笔之作。”^[3]到底要宣布什么?奈保尔在接受采访时说,小说表现了“大多数或者我们认识的许多人”的生活状态。”很显然,在古稀之年,他试图对以他为代表的流亡知识分子生活状态做一个总结,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文化无力,文化无根的困惑做一个了结。于是,小说中的主人公威利带着这些问题开始了人生,但就像作者本人一样,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感染,加上前殖民地与宗主国天然的二元对立,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是遥遥无期的,威利的人生也许注定是不完整的。

威利出生在印度的一个祭司家庭。其父为了抵制当时盛行的种姓制度娶了一个出身最低的女人,由此遭来非议。种姓等级的环境让威利鄙视他的家庭,受到殖民文化影响的他幻想去文明的国家。担心儿子会闹出什么事情来,父亲通过朋友安排他去英国读书,在伦敦虚度了四年后,威利觉得无事可做,有个崇拜他的女读者愿意接纳他,两人

结婚后,去了女孩的家乡——非洲的莫桑比克。但非洲残忍的种族斗争,原始野蛮的文化,可笑的后殖民统治让他无所适从,他不知道自己在非洲能做什么以及要做什么。有一天,他在家门口的台阶摔了一跤,恍如一梦,他空虚的内心终于醒了。一句“这不是我要的生活”让他离开家庭,来到德国妹妹的家里。在“我”存在,但“我”没有存在价值的尴尬境地里,威利虚度了半生光阴。他用某些方式试图来改善自己的这种无根的漂浮感,但他瞧不起印度的家,又很难融入到宗主国英国,到新的环境更让他惶恐不安。

一、文字的改造掩盖不了文化无力的尴尬

1932年,奈保尔出生在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由于英式殖民教育的影响,英国在年青的奈保尔心目中便是文明的梦想之地。由此,“欧洲作为一种完美的想象获得了一种巨大的空间价值,并导致殖民地的相对贬值。”^{[4][5]}他开始在心里否定自己的出生地。显然,处于文化政治优势的宗主国对于处于劣势、边缘的前殖民国的人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与奈保尔一样,威利小时候就开始鄙视自己的出生和家庭。他不满意自己的名字有英国大作家的影子,并因此看不起自己的爸爸。而发生在妈妈身上的种姓歧视也让他对妈妈产生了隔阂。家庭束缚着他,让他手足无措。但殖民地的教育却让他明白了接受西方教育,来自大国的那种优越感。他开始羡慕自己的加拿大老师,甚至想要“改信他们的宗教,变得像他们”^{[6][7]}。到伦敦求学,从殖民地到宗主国,威利的所见所闻加深了他对自己卑微文

收稿日期:2014-10-09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立项项目“V.S.奈保尔空间书写中‘地点’意义的研究”(项目编号:13g292)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静(1976—),女,汉族,四川万源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化身份的敏感。为了在英国获得与他们一样的满足感,做一个上流社会的文明人,他认为“他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重新塑造自己,自己的过去和自己的祖先。”^{[5]33-92}经过这一番文字游戏,他把自己的家庭与社会名流扯上关系;改变母亲的宗教信仰,家族则成了印度上流社会的一分子。显而易见,作为一个来自前殖民地的流亡知识分子,威利为了获得那种虚假的文化优势感,给自己设置了一个虚假的世界,暂时得到了心灵的慰藉。正如萨义德这样定义这一群人,认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于过于安逸。”^{[6]45}然而,威利只是在自欺欺人罢了,他不可能改变自己低微的出身和从殖民地来的事,更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杂交文化身份,从而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己处于边缘的文化无力和自卑感,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打破他与宗主国的二元对立。

二、写作不能改变他的文化身份

现实生活中的奈保尔饱受文化无根的困扰,但他最终选择在写作中确立自己“世界公民”的文化身份以及面对各种文化冷静观察,客观评价的写作风格。对于他,与其苦心去寻找自己向往而并不属于自己的文化之根,还不如对文化做一个旁观者,批评家。而且,对他来讲,写作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奈保尔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说到自己除了写作什么都不会。的确,他的一生除了写作没有干过别的事情。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写作可以让奈保尔暂时抛弃文化无根的烦恼,重新选择在写作时的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是,写作是奈保尔的生存方式,可以维持他的生计。但那种生活是窘迫的。在给姐姐的信中,奈保尔写到:“一篇小说我应该寄给英国广播公司,我可以挣到八个基尼。我没钱买鞋子,我只有两双旧的,都进过水。”^{[7]70}

在《浮生》中,威利在英国不能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并不能被所谓上流的社交圈真正地接纳,而写作是他唯一赖以生存的工具,他具有优秀的文学才华。但在伦敦这个世俗的社会,写作也变得世俗起来。为了找到出版商出版作品,打通自己的人脉,威利不得不参加一些所谓文艺人士的聚会,但却发现那是低俗矫情的。正如他的朋友罗杰所说的那样,这些附庸风雅的人物只不过想要给自己贴上高雅的标签,他们想要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威利被这样的环境搞得无所适从,文化边缘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善。从根本上,来自白人的那种自我、虚伪,是与威利的精神世界对立的。威利想要在英国

成为作家的梦想非常艰难。

研究奈保尔的专家吉利恩·杜丽强调指出,最重要的是奈保尔拒绝妥协以达到取悦讨好的观点。因此,追求真实是奈保尔写作的底线。而这种观念也体现在威利身上。对于后者来讲,在伦敦这个庸俗虚伪的社会里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似乎是不可能的。此外,对家乡狭隘有限的记忆满足不了他写作的素材,而在伦敦的生活又加深了他的文化不认同感,这使得他陷入精神危机。写作并不能让一个流亡知识分子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从而解决文化无根或无力的问题。

三、性掩饰不了内心的彷徨

“性”在奈保尔的小说里是极少出现的话题,这可能是受到印度教禁欲主义的影响。即便有涉及,“性”也具有别样的含义。比如在《游击队员》里,“性”带有强烈的政治喻指,成为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文学意象:个人权力斗争的决定性武器”^{[8]83}。

但在《浮生》中,性却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这可以看作是威利回归生活本身的一个标志。在《浮生》中,性可以给他带来作为男人存在的骄傲。第一次与珀西的女友琼发生关系后,虽然他有过短暂的懊悔。但他却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毕竟,“这个午后,他做了了不起的大事。他变成了另一个人。”^{[5]33-92}

另一方面,性只是空虚生活的一种调味剂,并不能成为精神寄托。诚如他在传记中说,妓女“给我以生活中别处无法寻得的性慰藉”,又说“这种女人不会教给我们什么东西。”^{[9]75}奈保尔认为性并不能满足他文化无根的空虚感。他笔下的人物也一样。在威利18年的非洲之旅中,就有这么一位给他带来快乐却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的人物:格拉莎,一个农场管理员的妻子。威利在非洲最后几年的生活,几乎是跟她的私情有关。一方面,他与妻子安娜保持一种纯洁的关系,甚至是敬畏她。另一方面,他在非洲的生活百无聊赖。格拉莎让威利体会到了性爱的欢愉,带来的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满足。性带来了短暂的快乐,让他的生活有了一丝亮点。但他后来发现格拉莎患有精神病,这让他对两人关系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性加剧了威利的精神失落感。“精神没有家园,灵魂没有依持,而这正是流亡知识分子根本意义上的无根状态,如果他们在精神层面不能得到优越感和安全感的话,最终必然进入精神危机。”^{[10]111}除此以外,在莫桑比克,种族混杂的问题更加突出,与其说这种现象加深了威利

对种族差别的认同感,不如说加重了他的失落感。非洲之行除了给他带来性的新鲜感,别无其他。起先,他是作为安娜伦敦男人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身份来到了莫桑比克,希望能在人种混居的环境中找到某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从他到达的那一天就消失了。面对神秘而宽大的房子,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面对周围“半黑半白”的人们,以及种族战争,他在文化、身份等问题上找不到共鸣,靠着安娜的供养生存又让他感到作为男人的自卑,更加剧了他的边缘感,这一切都意味着威利旨在开始新生活的构想变成泡影。

四、结语

作为一个有着混杂文化背景,心思极端敏感的流亡知识分子,奈保尔总是在感叹自己的流亡生活,身份和文化的无根。而在他古稀之年出版的作

品《浮生》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奈保尔为解决这些困惑所做的努力。很遗憾,这种努力似乎没有结果。《浮生》交待给我们的是威利失败的前半生:居无定所,生活没有着落和文化不能融入,他的前半生是失败的人生,文化无根,文化无力等问题将继续伴随着他。

有趣的是,对于在“林勃”状态生活已久的流亡知识分子来讲,威利或者奈保尔们能否真正地抛弃文化无根,从边缘走到中心,在现实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小说里,奈保尔对人生的不确定感时时充斥在文字中,他的虚无思想根源在哪儿?其多大程度受到它的影响?研究诸如此类问题会使我们对奈保尔有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认识,也使我们对以奈保尔为代表的流亡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有更多的理解和思考。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 Coetzee, J.M. The Razor's Edge.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48, Number 17, Nov. 2001.
- [2] Rachel Donadio, the Irascible Prophet: V.S.Naipaul at Home, i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05.
- [3] Farrukh Dhondy, Interview with Naipaul in Literary Review, August 2001.
- [4] 潘纯琳.奈保尔的空间书写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 [5] V.S.奈保尔.浮生[M].孟祥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 [6] 爱德华·塞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
- [7] V.S.奈保尔.奈保尔家书[M].北塔常文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 [8] 孙妮.种族·性·暴力政治——解读V.S.奈保尔的《游击队》[J].外国文学,2005(4).
- [9] 帕特里克·弗伦奇.世事如斯——奈保尔传.周成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 [10] 梅晓云.V.S.奈保尔的思想与印度存在主义[J].江西社会科学,2011(3).

Half A Life With Failures: On V.S.Naipaul's *Half A Life*

ZHOU Wen-j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3)

Abstract: Soon after Naipaul won the Nobel Prize he published his novel named *Half A Life*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main character's empty meaningless half a life but also his seeking for the answers to such questions like cultural weakness and rootless culture. However, he failed. As an exilic intellectual he is determined to have an incomplete life with rootless culture. So his half a life is a failure.

Key words: *Half A Life*; cultural weakness; cultural rootlessness; sex; exilic intellectuals

(责任编辑:周锦鹤)